

# 新总统哪天上任?这可不是儿戏



本报记者 王昱

一周史记

2016年是美国的选举年,熟悉美国政治的人都知道,美国总统就职的日期目前被定在1月20日,美国国会在1月中旬完成对选举人票的最终统计后,新总统几乎将立刻接任。然而,这个总统上任日期的确立,其实是很晚近的事情。事实上,在建国后绝大部分时间里,美国还真是每到总统交接时就会出现几个月“无人驾驶”的状态。因为在上世纪30年代之前,美国总统的就职日期被定在3月4日,新总统在选举中胜出后,要等两个月才能正式上班。

美国人为什么要让新总统如此千等呢?有一种说法认为,3月4日这个日期的订立是为了“秀情

怀”——据说古罗马英雄辛辛纳图斯就是在3月4日这一天被任命为独裁官的,此公临危受命,上任后外御强敌,而后很快将权力交还给人民,自己甘愿回乡种地,实乃美国国父敬仰的典范。订立这个日子作为权力交接日期,就是希望上任的总统都如同辛辛纳图斯一样功成不居。

不过,说归这么说,美国最初选择3月4日这个时间点让总统上任,恐怕更多是出于技术层面的考虑——在没有电子设备的200年前,各州统计选民的选票可是个费时费力的体力活,稍有差池,很可能耽搁时日,因此需要留出“提前量”。比如最早提议3月4日为总统上任日期的华盛顿,自己就没赶上这个“黄道吉日”——头一年年末选举后,各州统计选票的时间长达近四个月,就职时间不得不延后。

然而,随着计票效率和交通

状况的逐渐改善,美国大选这一制度设计的弊端逐渐体现出来。当选举结果公布后,美国就陷入了一种新总统“说了不算”(因为还没上任),老总统“算了不说”(因为横竖马上要交班了)的尴尬状态。如果新总统与老总统属同一党派,是其政策的继承者还好说,如果两人恰好是政见相左的死对头,那乐子就大了。事实上,这种事情早在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和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接班时就发生了,亚当斯为了给杰弗逊使绊子,趁着自己还在任上的两个月时间通过了一系列自己支持的法案,还一口气任命了40多位自己党派的地方法官,着实为接任的这位政敌准备了一份“大礼”。

比亚当斯这种“急作为”更可怕的,是这段“空白期”中可能出现的国家“无主”状态——1933年,罗斯福击败胡佛成为美国新

一任总统,当时美国正在大萧条中辗转反侧,国家政策稍有风吹草动,扩散到经济领域就是一轮轩然大波,所以胡佛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他得知败选结果后的第一反应,就是想跟罗斯福谈谈,搞个联合声明,保证国家政策的延续性。为此他还特意给罗斯福写了一封长信,阐述自己的想法。有趣的是,由于过于紧张,胡佛在信中还把罗斯福的名字拼错了,可见当时情况有多危急。

虽然胡佛如此诚恳,罗斯福那边就是不接茬,不仅拒不发表联合声明,连礼节性的接触都能省则省。两位新老总统之间这么“怄气”,最终苦了却是美国的普罗大众。由于胡佛政府说话已经没人听,又没人能看清罗斯福想要搞啥,美国经济陷入了自1929年之后最大的一轮恐慌当中:股市连月暴跌,物价一天一个

样,银行门口天天有人排长队,出现大规模挤兑风潮。著名银行家小摩根后来回忆说,1933年最初那两个月是他所经历的“最恐怖的岁月”,如果这种状态再持续一个月,美国经济就完蛋了。

幸而,1933年3月4日,罗斯福终于接任美国总统,上台后立刻宣布对银行进行停业整顿,著名的“罗斯福新政”开始了。总算度过一劫的美国人擦了一把冷汗,决心再也不这么玩险的了,于是就在这一年,美国国会通过宪法第二十条修正案,宣布自此以后总统的上任时间调整为1月20日。

新总统哪天上班?在繁杂的选举制度中,这几乎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细节。然而,这样的小细节上稍有差池,却能闯下如斯大祸。人们常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但由此观之,民主未尝不是一样需要精雕细琢的工艺。

# 脱欧还是留欧?

## 英国与欧盟40年前的纠结

2月20日,在经过了长达30多个小时的马拉松长谈之后,英国首相卡梅伦终于与欧盟其他27国领导人达成一致:欧盟将允许英国拥有“特殊地位”。以此为前提,卡梅伦宣布,英国将于今年6月23日进行全民公投,商讨英国是否要留在欧盟的史事。

英国用全民公投的方式决定自己与欧盟的关系,对于这一幕,相信上了岁数的英国人会有十分强烈的“即视感”,因为早在40年前,英国就曾经闹过这么一出,只是那时英国纠结是否要离开的对象还不叫“欧盟”,而是其前身“欧共体”。名头虽然变了,英国人今日对欧盟的恩怨纠结,仍是不改当年。

▶1975年,撒切尔夫人(右二)和支持英国留在欧共体的民众一同亮相。(资料片)



本报记者 王昱

## “结婚”不易

时光拨回到1944年,虽然那时二战还没有结束,但美国政府已经开始思考战后的世界格局分配问题。话说有一天,罗斯福总统看着欧洲地图,突然向他的僚属们问了一个问题:“战后的欧洲是否会形成一个联合体?如果形成,我们的朋友英国会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罗斯福的这个问题,可以说既充满了预见性又暗藏着顾虑。在二战期间,英国作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获得了美国最多的扶持和援助。然而,如果英国在战后选择与欧洲大陆国家共进退,美国很可能重演一战后沦为新世界秩序配角的尴尬故事。

对于总统的这份顾虑,时任美国国务卿斯提克斯保证说,不可能,理由是:英国在任何自己都不占据领导地位的俱乐部里,永远都是不舒服的。

斯提克斯的这个论断,几乎成为英国后来与欧盟纠结情缘的一道诅咒。二战结束后,以法国和西德为首的欧洲核心国家开启的欧洲一体化进程,成为区域一体化发展最灿烂的风景,欧洲联合自强结出初步硕果。在法德塑造欧共体时,英国一直是“观望者”。后来,英国的态度开始由观望

转向融入,个中原因是欧共体市场对英国吸引力大增,同时美苏出现缓和,英美特殊关系开始松动,英联邦也日趋松散。眼看海峡对面逐渐形成一个同盟,英国决定加入这个集团。

1961年英国正式提交加入欧共体的申请,当时,英国对入欧的态度可谓非常认真,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曾经对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说:“请相信我!我们现在已经不是维多利亚女王、吉普林(英国诗人,其所生活的年代正值欧洲殖民国家向其他国家疯狂扩张的时期)、大英帝国‘光荣孤立’时代的英国了。在我们国家,很多人,特别是青年,感到我们应该创造一部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历史……让我们把欧洲团结起来吧,亲爱的朋友!我们三个人可以一起干:您、我和(西德总理)阿登纳。”

然而,面对如此感人肺腑的言论,戴高乐却来了个“十动然拒”,他将英国视为美国打入欧共体的“特洛伊木马”,暗示只要自己在位,就不会答应英国的入欧请求。当然,戴高乐这样做肯定不是幼稚地基于英法长久以来的历史恩怨,而是基于英国独特的国际立场。首先,英国本身就是个金融大国,更有美国兄弟在台前幕后的种种暗箱协作。另外,欧盟作为一个共同体,是想脱离其作为北约成员而受到的来自美国方面的限制,因而对于英国这个一峡相隔的欧洲异类

显然是顾虑重重。

来自戴高乐的阻力一直到1969年他辞掉总统一职后才有了明显的转变,新上任的法国总统蓬皮杜致力于推进欧洲一体化,与英国政府互作让步。终于在1972年,英国在欧共体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正式签署加入条约。1973年1月,英国成为欧共体成员国。当时的英国报纸曾经将英国入欧称为“艰难的婚礼”,英国入欧之路的曲折可见一斑。

## 差点“闪离”

然而,对于来之不易的这场“婚姻”,英国国内几乎是在刚刚签字的那一刻就出现了“悔婚”的倾向——当时在野的工党揪住入欧一事,批判执政的保守党一心只想要打开欧洲,却忽略了英国产业工人入欧后可能面临的利益损害。在这一批判的影响下,一手将英国送上欧共体战车的保守党内阁倒台。新上任的工党首相威尔逊宣布,将在1975年进行一次全民公投,重新考虑是否留在欧共体中。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与很多人的想象不同,在当时英国大多数政客的眼中,全民公投并非解决政治分歧的良法。在西方近代政治学中,全民公投其实是一种不怎么可靠的表决方式,只有像古希腊那样幼稚而不成熟的制

度才喜欢搞全民公投(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是被雅典城的全民公投处死的)。在相对保守的英国政客看来,让公众越过受过政治训练的职业议员,冲到台前直接对某个复杂而远离他们日常生活的政治、外交问题进行投票,这样做不仅冒险,而且不负责任。当时担任保守党党魁的撒切尔夫人,在获知工党欲举行脱欧公投时,就曾经大骂工党政府无能,“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就用公投的方式把这个大麻烦像垃圾桶一样踢给国民。”

在新政府内部,反对公投者也大有人在,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卡拉汉就极力反对贸然公投,他形象地比喻说:“所谓公投计划,就像是一条小小的橡皮救生筏,只有到了万不得已的一天,才能去依赖它。”

然而,时任首相的威尔逊遇到了如今卡梅伦同样的尴尬——他明知公投不靠谱,脱欧也非明智选择,却不得不选择这种方式。因为以当时工党资深政治人物托尼·本为代表的党内力量,竭力抵制“欧洲共同市场”的想法,如果不满足这一派别的愿望,威尔逊内阁很可能面临倒台,所以威尔逊只能赌一把,“相信大多数英国人的理智”。

万幸的是,威尔逊最终赌对了,1975年6月5日的公投中,支持英国继续留在欧洲共同体的选民比例占到67%。当时多数英

国人的看法差不多:虽然和欧洲邻居相处有诸多不易,但放眼未来还是值得留下。一直支持英国留在欧共体的威尔逊在获知这一结果后十分高兴,他后来回忆说:“我不敢想象如果民众选择离开会带来什么:英国将丧失欧洲的市场,还会丧失作为一个国家的信誉。”

对比看来,目前卡梅伦无论党内处境还是发起公投的动机都与当年的威尔逊十分相似,不过,卡梅伦存在两个显而易见的劣势:首先,英国人对于欧盟的期望值早已大不如前了,当年英国国民多数对于本国的国力发展缺乏自信,对于是否可以鼓起勇气对欧共体说再见,多数英国人觉得自己并不具备足够的主见。英国《经济学家》在1975年公布对600多家企业总裁的调查访问,95%的受访者表示希望英国继续留在欧共体,这种情况在今天已经不复存在。其次,英国选民的心态也在这些年发生变化,如今的英国早已告别威尔逊时代,尤其是极不愿跟着主流政治家人云亦云了。

所以,当卡梅伦因为不堪党内“脱欧”声音困扰,再次祭起“公投”这块挡箭牌时,他无疑正在开启一场比前人更大的赌博。有一个问题是值得思考的,万一英国人真的在“脱欧公投”中选择了离开,英国真的能够承受与欧盟“离婚”的损失吗?